

格致书屋

张松“过目不忘”与智力崇拜

■隋淑光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对记忆力表现出了别样的推崇，这大概和我国传统的崇尚“博闻强识”的教育倾向、以识记为基础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包含记忆力崇拜的智力崇拜有关。】

在《三国演义》中，张松虽然出场次数不多，却带着“智慧”的高光。他折冲于樽俎之间，处危地而不惊，面对曹操、杨修的诘难才如泉涌、舌辩如剑，以才智让曹操束手，让杨修心折，尤为奇特的是他在读《孟德新书》时以超强的瞬时记忆力迷惑了曹操：“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遂使该书被付之一炬，未问世而成绝响。

罗贯中的通俗演绎，使三国这段历史成为国人最熟知的一段古代史，功莫大焉，同时也使得张松作为具有超强记忆力的代表人物而广为人知。流风所及，甚至影响了金庸先生，在其所著的《射雕英雄传》中，黄夫人背诵《九阴真经》的情节与此极为相似。舍小说之外，历史上真有这种具超强记忆力的人物吗？据各种史籍记载，与张松同时代的王粲、蔡文姬，以及东汉初期的王充、东汉末年的应奉，以及唐代的常敬忠等均以“强识”知名。

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这样评价他：“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璜、东平刘楨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驎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如桀之初征，登楼、檄贼、征思，干之玄猿、漏厄、圆扇、楯赋、虽张、蔡不过也……”

据《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王粲去拜访才学优长、位高爵显的左中郎将蔡邕，蔡邕倒屣相迎。其时蔡家宾客盈门，见其如此礼敬年龄幼弱、容状短小的王粲，举坐尽惊。蔡邕解释道：此人有望

才，我不如他，我收藏的文章书籍，将来要由他承继。蔡邕喜藏书，多达万卷，在晚年果然给王粲拉去了几车。有一次王粲与友人同行，边走边读道旁的碑文。友人问他能不能背诵出来，他于是试背，竟然没有错一字。他观看别人下围棋，见棋局被不慎弄乱，于是把棋子一一复原。下棋的人也不能确认原来的布局，不信他竟然有这样的记忆力，遂重新布设一局，用巾帕覆盖，让他用另一副棋复原。王粲复原之后，两相比较，竟然一子不错。

蔡文姬为蔡邕的女儿，才气纵横，精音律、文学和书法。据《太平御览》记载，蔡邕抚琴时偶断一弦，在隔壁房间倾听的蔡文姬竟然辨别出断的是琴上第几根弦，屡试不爽。据范曄《后汉书》记载，汉末战火纷扰，匈奴乘机劫掠中原，蔡文姬被左贤王掳走，被迫委身匈奴人，并生有两子。漂泊12年后，曹操统一北方，用重金将其赎回，问她：听说你的家里曾经收藏了很多典籍，现在你还能记起来吗？蔡文姬回答道：先父曾经赐给我4000多卷书，但经历战火离散，已经全部遗失，现在能记忆的只有400多篇。曹操请她誊录，她于是把这400多篇文章一一默写出来，无一遗漏。

稍早于三国时期的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同样具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能力。据范曄《后汉书》记载：“(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应奉生活于东汉中期。据范曄《后汉书·应奉传》，其自幼就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读书一目五行，遇到的人和事均过目不忘，年长以后为郡曹，有一次在辖区巡查40多个县，记录了成百上千罪囚的案情。返回以后太守问起来，他一一数说罪囚的姓名及定罪情况，毫厘不爽。

谢承是三国时吴国国主孙权的妻弟，他也著有一部《后汉书》。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李贤曾经召集文官对此书进行注引，其中进一步记载了应奉的事例：有一次应奉去拜访彭城长官袁贺不遇，转身要

离开时，袁家有位正在制作车子的工匠从门内露出半张脸看了他一眼。数十年以后，二人路遇，应奉主动向车匠打招呼，车匠不明所以，经过询问才知道原因。这个事后来演变成了成语“半面之交”。

唐代人封演在其所撰写的《封氏闻见记·颖悟》中记载了常敬忠“七遍诵万言”的事例：常敬忠上书自荐“读一遍能背诵千言”，由此得以参加内阁中书的选拔考试。考官问他：“学士能一遍诵千言，能十遍诵万言乎？”常敬忠回答未曾尝试过。于是考官拿出一本未曾面世的书，让他读十遍后试着背诵。常敬忠正襟危坐，专心诵读，每读一遍就画地为标记。读完第七遍后起身，说可以背诵了。考官说可以读完十遍后再背，常敬忠回答：“若十遍，即是十遍诵得，今七遍诵得，何要满十？”遂背诵，主考官手执书本对照，竟然“观览不暇”。顷刻之间背诵完毕，不错一字，“见者莫不叹赏”。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对记忆力表现出了别样的推崇，这大概和我国传统的崇尚“博闻强识”的教育倾向、以识记为基础的人才选拔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包含记忆力崇拜的智力崇拜有关。

历史上的张松在三国历史的特定阶段，即劝说刘璋迎刘备入蜀这一事件上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在《三国志》中无传，其事迹散见于《刘璋传》和《法正传》。据两传记载，刘璋曾三次遣使致敬曹操，而在第三次，即张松为使时，适逢曹操平定荆州，志得意满，因此未留用。张松因此怨尤，遂有了劝说刘璋迎刘备入蜀之举。

真实的张松无疑是机警百变的人物，但在《三国志》中却未记载他以“强记”知名，因此背诵《孟德新书》这一事例未必为信史。《三国演义》或许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智力崇拜意识最为浓郁的一种，鲁迅先生曾以“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来评价诸葛亮这一形象，此外书中文人弄巧的情节所在皆是。罗贯中之所以把超强的记忆能力迁移到张松身上，其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书话岁月

【叶圣陶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了我一种不曾有过的乐趣。”】

9月15日是丰子恺先生逝世40周年。我与丰子恺先生从未谋面，但是说起来还是有点缘分。那年在台湾阿里山去山巅的祝山观日出，下山后便踏着石阶信步而行。无意中竟进了山腰一座古刹，参拜了金灿灿的大佛，待到将要迈入大殿时，香案上的宣传品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一些免费赠送的印刷品，有佛经，有讲因果报应劝人行善的善书，都是虔诚的信男善女赠予寺庙广结善缘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一本印刷品吸引了我，浅绿封面，上书“护生画集”，作者是丰子恺。

《护生画集》是丰子恺的一部颇有影响的画集，它的成书经过也很奇特：1927年的一天，丰子恺在上海法租界的家里接待弘一法师（即李叔同先生），双方商定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撰文，共同编写《护生画集》。这是一部宣扬爱护生灵、爱护一切弱小生命的漫画图书，既体现了佛教的众生平等，不杀生的教义，也提出了以仁爱之心对待万物，生物之间和谐共存的理念。这本画册很可说明丰子恺的善良和无比的爱心，在那个充满暴力、仇恨、血腥、杀戮的时代，这是一种可贵的良知。

我的台湾之旅，能在深山古刹得到一册《护生画集》，实属幸事。

丰子恺(1898-1975)的漫画在我国艺术界独树一帜，深受大人孩子欢迎。叶圣陶特别赞赏丰子恺以寥寥几笔，诠释古典诗词意境的画，以及从现实取材，画出孩子内心世界，充满童趣的漫画。他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了我一种不曾有过的乐趣。这种乐趣超越了形似和神似的鉴赏，而达到相与会心的感受。”

多才多艺的丰子恺，不仅是杰出的画家，还是音乐家、书法家、翻译家、散文家。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以后，缘缘堂成为多部散文集的书名，如《缘缘堂再笔》《缘缘堂续笔》等。

说起“缘缘堂”，这是丰子恺在家乡——浙

漫说丰子恺

■金涛

江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梅纱弄老屋后面建造的一幢小楼，命名为“缘缘堂”：“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形式朴素，不事雕饰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奉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屋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房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兼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见《还我缘缘堂》）

这是丰子恺以半生积蓄，倾其所有，为自己为儿孙精心营造的一处私宅，也是画家创作的工作场地。然而在日寇侵华战争中，这幢民居与周围乡邻的房舍成为日军飞机频频轰炸的目标，终于在1938年1月全部被毁。万幸的是一家老小及时撤出，远走大后方，保全了性命。

得知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十分痛惜，为此他写了好几篇文章追忆往事，像追忆失去的老友，他在《还我缘缘堂》中写道：“在最后胜利之日，我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

时至今日，日本战败投降已经70年，日本至今没有赔偿中国老百姓蒙受的损失！丰子恺的“缘缘堂”也是如此。

今年，还有两件事与丰子恺有关，值得一记：一是年初住院，同一病房的病友，闲谈之间，得知丰子恺是他的舅父，于是说了不少有趣的话题。

二是近日淘得一本“浙江南北2013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丰子恺作品专场”精美的宣传册。这次拍卖会据称是为纪念丰先生诞辰115周年，宣传册内印有丰子恺的漫画、扇面、书法共28件，彩印，非常精美，此外还附有郑振铎、巴金和叶圣陶的回忆文章，也很有纪念意义。

磕长头朝圣见微

■郑千里

【然而最近两三年，进入拉萨的109国道上，却未发生涉及朝圣信众的交通事故——因为信众身上多了一件“护身服”——2003年，当雄县交警大队“贴心”行动，为信众免费定制发放了6000多件反光背心。】

在我国西部，特别是在藏族聚居地区，不难看到感人的一幕：一路磕着长头的朝圣者。我在30年前的夏天赴西藏，第一次目睹到这个场面，比起此前在影视和书本里的所见所闻，带给我的巨大震撼至今记忆犹新。过后，我曾多次到西藏、青海等藏区行走，也常有类似的经历，归根结底都是：为他们虔诚万分地执着信念震撼！

磕长头，是藏传佛教信众最为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

因为千里迢迢，因为跋山涉水，更因为餐风露宿，宵衣旰食，他们大多身上的围裙已打上补丁，破烂不堪的护腕已抽出了丝缕，甚至膝盖、手腕、额头早已磕出血丝，结成痂皮。而沿路的灰尘和泥泞，也使得他们浑身上下脏兮兮，甚至气味难闻。

但是他们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眼眸闪现的执着光亮，神情呈现的平静安详，让目睹的芸芸众生肃然，无不顿起敬意。有些人用钱供佛，这些信徒是用全身心侍佛奉佛，故此，哪怕独自一人孤寂地在漫漫长路上磕长头，他们的内心也绝不孤独，绝不惧怕，磕头，更不觉枯燥乏味和劳顿。因为，一种强大无比的信仰的力量，已完全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铭刻在他们的意念中，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图腾。

拍摄电影《可可西里》时，难怪导演陆川会由衷地说：别看磕长头的身上脏，但他们的心是最干净的。

今夏我在甘南行走，发现了一个过去未曾看到的情形：前往拉卜楞寺或郎木寺，公路交警部门从细微处见精神，在朝圣者经常过的道路两旁，已专门为其竖立起“请注意避让”的警示牌。这警示牌很合乎规范和标准，白蓝相间的醒目大字，完全足以提示来往车辆。

在少数民族地区，对交通标识进行人性化的因地制宜，是政府公共事务管理水平的一种进步，也是对宗教和民俗的一种尊重。执政为民，执政还要亲民，对交警部门如今管理能力的提高，我心里顿时生出些许感动。

以藏民为主的信众虔诚地磕长头，虽然会注意避让路上飞驰的车辆，但在磕长头过程中重复匍匐、起立，往来车辆有时避让不及，存在着巨大的交通隐患。然而最近两三年，进入拉萨的109国道上，却未发生涉及朝圣信众的交通事故——因为信众身上多了一件“护身服”——2003年，当雄县交警大队“贴心”行动，为信众免费定制发放了6000多件反光背心。

知道如何与信众“贴心”，并付诸具体的实践，这看似一件很细微的事，却让人很是“暖心”。

当然我也注意到，随着现如今藏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他们在千辛万苦磕长头的朝圣行旅中，已不是早年那样的衣裳褴褛，污垢满面。

我在前往郎木寺的路上看到，一位前往朝圣的中年女性藏民，虽然磕长头时的神情仍然是坚毅如昨，动作仍然是一丝不苟，但却不像我早些年所看到的那些信众，虽无“笨路”却堪称“蓝缕”。这位女信众出现在我今夏的视线中，全然更新了我在脑海中国有的对先众的印象。她虽然也被高原的紫外线晒得脸黑黑透红，但衣着服饰却显得十分干净整洁，甚至有几分光鲜和亮丽。

而且，更让我很是惊诧的是，她虽然也循规蹈矩地一步一磕头，但却与往常那些不携别物的信众不同，携带有一块约一米多的长方形地毯，绚丽鲜艳的羊毛地毯。她将这块地毯铺在道路上面，随着自己的不断匍匐磕头向前，不断地也将地毯也向前挪移。

显然，这块不断挪动的这块地毯，可以在行进中帮助和保护她，防止膝盖和手腕关节、乃至脑门在磕长头中无时不刻都会造成的磕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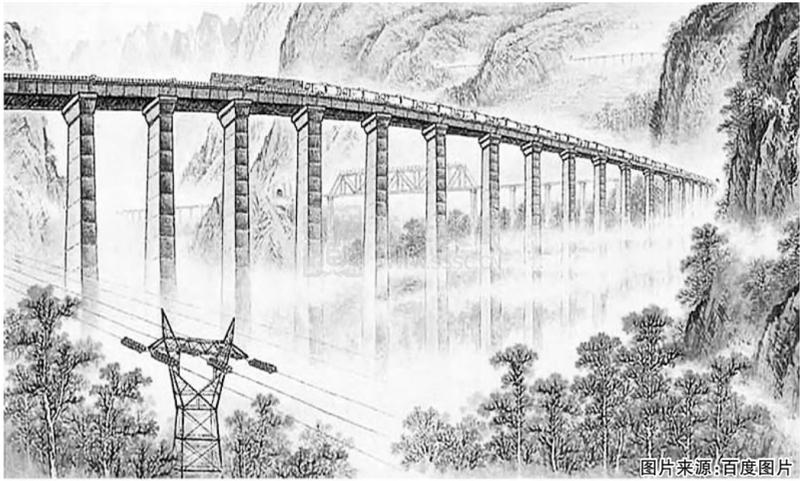
虔诚朝圣的磕长头者男女老少都有。作为磕长头的一种防护措施，过去通常地，信徒手上会戴着木板裹着布条等做成的、藏语叫作“恰克新”的护套，胸前也会挂上一块厚实的布围裙，以这点再也简陋不过的“装备”自身，沿着漫漫公路，向着他们心目中的圣地——无论是布达拉宫还是郎木寺，一步一磕头，艰难而又顽强地前进。但像这位女信众这样的地毯防护“装备”，这还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

虽然我也算是“行万里路”之人，但对那些磕长头朝圣者的了解，可能还局限于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就难免是井底之蛙，孤陋寡闻。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达，汉人的和尚在寺庙之中诵佛念经，经常都会以录音机和光盘替代，美其名曰“提高工作效率”，而藏传佛教中的普通信徒——他们不是“专业”的僧侣——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大幅提高之后，为什么在磕长头朝圣时，就必须拘泥于以往的所有一切做法，就不能改善一下自己的“装备”，对血肉之躯加以必要的防护，而非得付出不断磕头时“头破血流”的代价吗？

朝圣者是用身体，而不仅仅是用双脚，“走”过了甚至千里万里的漫漫长路。我们在其“高原红”的脸上，看不到丝毫的痛苦和疲惫，更看不到丝毫的委屈和埋怨，看到的只有执着中的坚毅，带着信念和心愿的隐忍。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在路上走多长时间，但他们坚信自己一定会到达心目中的圣地——哪怕在路途中的某一处突然就此匍匐不起，这里就已然心中的圣地，佛祖已经在这里把自己的灵魂取去，自己也就此了却了一生的最大心愿。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无论如何，面对这些有着执着信仰的人们，包括现如今俯首地磕长头朝圣的人，我内心对他们都十分佩服和敬重。

见微知著。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阆苑有书

有关火车的各种“突发奇想”

■星河

【想起一篇绝境求生的教诲：在彪悍的自然力量或现代大型机械面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有多么强大。我们都不是那些电影大片中的英雄。】

前不久看到湖南五名少年因在铁轨上照相而“逼”停火车的新闻，让我想起很多往事。

印象最深的，是许多年前刊发在报纸上的一张黑白照片，可惜忘记是哪份报纸了。原文的题目应该是《快门按下0.8秒之后》，讲述了一场年轻人在铁轨上照相出事的悲剧。三名年轻人在铁轨附近照相，结果他们突发奇想，希望留下一张背景上有火车的照片。于是两人等在铁轨上，一人准备照相。过了一段时间，火车真的开来，快门被按下……

我当时就猜想，他们一定事先商量好了：“你一下下快门，马上就让我们跑！”然而，人的反应能力和语言的传递速度远不及火车，仅仅在快门按下0.8秒之后，火车便倏然而至，碾过了两名被摄者的身軀……

负责摄影的年轻人毕竟在铁轨之外，所以侥幸逃生，为两名死者留下了人生中最后的形象——一张背景上有火车的照片。而这张照片的得来，却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还听过一些故事：在我所居住的大学附近，有一条铁路通过，周边的学生经常到那里散步游玩。有一年，一男两女三名大学生，也是突发奇想，想要俯卧在铁轨上，让火车从头顶上通过！也许他们看多了各种电影或回忆里的故事：主人公不慎掉下铁轨，而火车正飞驰而来；主人公旋即俯身铁轨之间，火车在头顶上隆隆通过；过去之后主人公重新起身，原来是虚惊一场。

即便我们假定这些回忆都是完全真实的，还是不足以支持这三名大学生的冒险举动。也许火车当年的结构与现在不同，也许还存在别的原因，才导致了那些卧轨者的侥幸生还；最重要

的一点是，那些对冒险行为的叙述并非有意为之的炫耀，而是对突发事件仓促应对的追忆——因为那些因此而出事的人，肯定无法再追忆了。

总之，悲剧发生了：三名大学生依次趴在铁轨上，那名男生首当其冲，两名女生紧随其后。火车疾驶而来，待司机发现险情之际为时已晚，虽说他还是赶紧刹车，但这三名大学生却不如上述五名湖南少年一般幸运。当火车完全停下时，车头已在一名女生的上方，而那名男生已处于第一节车厢下方——两名女生得救，那名男生殒命。

想起一篇绝境求生的教诲：在彪悍的自然力量或现代大型机械面前，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有多么强大。我们都不是那些电影大片中的英雄。

其实有关铁路，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真可谓不胜枚举。我自己小时候也在铁轨边玩过一些惊险的游戏，现在想想都很可怕；成年后我在乘车时还遭遇过一块砖头砸碎车窗飞进车厢并落在我头边桌上的惊险经历。但讲到这里，总觉得悲剧感有些太强，还是让我们回忆一些有关火车的稍微轻松的“奇想”吧。

在“文革”期间曾拍过一部电影，片名和情节早已忘记，但最后的结局却令人记忆犹新：一名破坏分子把铁轨上的一个螺丝卸下，企图让经过的火车出轨翻车。破坏行为刚好被主人公发现，破坏分子逃离，但螺丝也被带走，这段铁轨就悬空断在那里，而此时此刻一列火车正在驶来。

那时的电影是一定要彰显主人公之伟岸的。于是，主人公用随身携带的钳子之类的工具，把两节铁轨紧紧地扣在一起，自己站在下面的坑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坑？也是破坏分子挖的？不记得了），然后扛住这把钳子。

火车呼啸而来，主人公微笑着扛着钳子，就这样用肩膀扛了20多分钟火车！

有便利条件的电影工作者不妨去找找，在我们的电影资料馆藏中，一定有这样一部电影。

中英村诗苑

七绝

登石坑崆

■曾庆存

昆仑龙到石坑崆，化作广东第一峰，五岭东朝迎紫气，岭南岭北尽英雄。

竹枝词

■刘徐圣

回龙观里建新区，密林深处龙禧居。采菊东篱陶公乐，半床报纸半床书。

五律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

■张许瑰

伏俟十四载，光复见晴天。血浴江山赤，骨埋丘壑斑。吾侪思殒恸，尔辈拜神欢。鞭策我惊悟，驱驰箭上弦。

七律

读总书记讲话

■余德浩

金秋十月沐朝阳，老树新花万里香。落叶浮萍追腐臭，清流活水润华章。当知媚俗非通俗，莫认无常作正常。七十二年风雨路，复兴文艺上康庄。

七律

颐和园秋韵

■马道骏

雨后蝉嘶乱如麻，长堤绿柳影斜斜。烟笼湖水碧波静，舟横白鸟景色佳。莲藕有心迎日月，玉桥无语卧残霞。游人尽兴游乐处，从前曾是帝王家。

七绝

沙漠绿洲

■宋文龙

身居绿岛乐悠悠，遍地黄金不用收。空气清新溪水碧，强热洁钩找烦愁。

七律

咏大觉寺玉兰花

■白彤霞

铜雀春深锁二乔，千年古刹也藏娇。玉容未损神仙骨，清韵依然入凤箫。雪蕊临风香溢远，绿衣待月色如烧。桑田沧海难回首，梦里乾坤换斗杓。